

# 新中国“将军大使”是怎样炼成的

1949年11月8日,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,强调“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”,“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”,“一切都要正规化,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”。至1950年底,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,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建立起来了。第一批15位大使当中,除了王稼祥、姚仲明、吉雅泰、王任叔、冯铨为党政干部外,其余10位皆来自野战部队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将军大使”。

## 毛岸英为“将军大使”当翻译

为了让突然转行外交战线的将军们更快适应“大使”这一新的角色,外交部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举办了学习班,地址就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。

10位“将军大使”中,有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袁仲贤,有黄镇和他宁都暴动时的老战友姬鹏飞、王幼平,有曾参加过军调部与国民党、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的耿飏、韩念龙。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,但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儒将。

待“将军大使”选定之后,外交部又陆续从各野战军选调一大批师、团级干部,充任驻外使馆秘书、参赞。整个新华饭店都住着外交部从军队选调来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。战友相聚,热闹非凡。

新华饭店有当时最摩登的西洋陈设,本来住在这里是一种享受,可将军们习惯了睡草席、门板、土炕的日子,现在突然要睡高级饭店的弹簧床,一时间还真有点不习惯。耿飏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:“房间里的卫生设备,弹簧床,地毯,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,甚至不自在。但是,我们知道,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并习惯,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生活的习惯。”

学习班先后请来了各方面的学者、专家为将军们讲授国际法、外交史、领事条约、外交文书、国际法庭、联合国宪章、外交特权与豁免等方面的知识。主要请来国内的学者何思敬、王铁崖等人讲授国际法,还请国家各部门领导人介绍情况。培训期间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,展品中有国书、照会、备忘录、电报、会谈纪要、双边协议等各式各样的文件。“将军大使”及其夫人过去谁也没有见过这些文件,看后大开眼界。黄镇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:“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!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学习班还邀请苏联、匈牙利、波兰、

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驻华大使前来介绍他们国家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情况、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。苏联和东欧国家大使作报告时,主要由毛岸英当翻译,毛岸英还为学员们讲了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和体会。

## 西餐礼仪一度难倒众位将军

“将军大使”们还要重点学习衣食住行等“琐碎”的事情,由胡济邦、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亲自讲授相关礼节。为了学习西餐就餐礼仪,“将军大使”和夫人们专门到北京饭店观摩服务员如何摆台、上菜、斟酒,学习如何使用刀叉,如何喝汤、让酒、布菜,如何尊重女士等。

吃西餐之前,首先由胡济邦对将军夫人们的着装进行检查。胡济邦过去是中共地下党员,在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当秘书。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,连连咂嘴:“不行,你的内裤太长,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,内裤可不能露出来。”

黄镇的夫人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,出门前她还着实收拾了一番,解开领扣,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处拽了拽,再照照镜子,觉得自己是从未有过的漂亮。谁知胡济邦对她皱起了眉头:“不行,背心不能露在胸前,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。”

胡济邦又指着夫人们的头发数落着:“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,要烫发,还要搽点粉,抹点口红……”

在西餐室,55岁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招呼大家入席。他是辽宁海城人,极富口才,曾公费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。抗战时期在重庆,是蒋介石、宋美龄身边的红人。其实他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,一直在国民党上层开展统战工作,是个“外事通”。此时,阎宝航抖抖餐巾,铺在胸前,做着示范,向大家解释:“平时参加招待会,不光是吃喝玩乐,和人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做工作,了解情况……”

后来担任过驻马来西亚、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王幼平回忆:“授课老师要求我们,吃西餐时如果吃着骨头了也不能往外吐,吐出来会很不好看。所以吃西餐时我们都把骨头当地雷一样看待,尤其要当心把骨头吃到嘴里。”

往日指挥千军万马得心应手的将军们,面对小小的刀叉,一度显得笨手笨脚。加上身着笔挺的西服,又要保持优雅的动作,有的人常常为吃一块牛排而满头大汗。好在经过一番苦练,将军们终于

熟练掌握了刀叉的使用方法,在言行举止上变得越来越像合格的外交官。

## 将军们“偷窥”外事礼仪

1950年3月10日下午,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,这可是难得的一次见习机会。经周恩来同意,将军们被安排在递交国书的勤政殿旁边的小房间里,透过捅破窗户纸制造的小孔,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。仪式开始前,周恩来特地嘱咐窗户上的小孔不要捅得太大,以免被外国人看见殿堂里到处有小孔不雅观,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。

仪式结束后,客人一走,未来的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,热烈地讨论起来,并当即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子里你当元首、我呈国书地演练起来。演练完之后,周恩来便领着大家去见毛泽东主席。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,当走到黄镇面前时,毛泽东好像想起来什么事,便问道:“黄镇,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,改了做什么?”黄镇答道:“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,时刻保持镇静。”

毛泽东说:“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。《楚辞》中说:‘白玉兮为镇,玉可碎而不改其白,竹可黄而不改其节。’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。”

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说道: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“另起炉灶”需要新的外交干部。现在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,但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。他接着列举了汉代的班超、张骞的故事,指出尽管他们不懂外语,但他们出使西域,不但能够不辱使命,而且功绩卓著。毛泽东告诉大家,虽然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,可从长远来看,还是要像总理所说的,学点驻在国的语言文字,只有懂得外语,才能阅读当地报纸、和别人交谈,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。

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将军当大使的优点:首先,你们出去我们放心,因为你们不会跑掉。其次,你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参谋长,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,当然政治部主任也善于调查研究。所以,你们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,也要开展调查研究。毛泽东还联系宋代的沈括,讲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:“谈到调查研究,我们不妨学学宋代的沈括。他每到一个地方,总要把那里的城镇关隘、山脉河流,详细记载下来绘成地图,对当地的土地物产、风俗人情也都了如指掌。”

在接见中,毛泽东还说:“你们这些

将军出国当大使,不算转业,可以保留军籍。”

## “武仗不打了,文仗还要打”

1950年7月,学习班结束后,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、参赞和秘书的名单。7月12日下午,周恩来召集即将赴任的大使黄镇、耿飏、谭希林、王幼平、彭明治等开会。会上,周恩来向大使们细细叮嘱交代:“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,选了又选。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,武仗不打了,文仗还要打。”

耿飏在其回忆录里对自己赴任大使的经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:

“1950年7月初,外交部催促我即刻赴任,因为瑞典驻华大使已经来到北京上任。我偕同使馆的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,连同家属共二三十人,乘坐国际列车,离开北京向莫斯科进发……一到莫斯科我们立即通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同瑞典外交部联系。但是,得到的回答却是每年的7月和8月是瑞典法定休假期,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已离开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。到一个岛上休假去了,外交部的官员们大都也去休假了,只有少数工作人员留守值班。所以,这位值班人员希望我们到9月份再去瑞典。根据这个情况……我们一行便在9月初离开莫斯科……于10日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。”

1950年10月1日,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,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,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。这是中国驻瑞典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,赴任不久的耿飏大使穿梭于席间,有人问他:“你是将军,曾经带过多少兵?”耿飏笑笑说:“我带的兵,也就十多万吧。”对方听后肃然起敬,说道:“真了不起,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。”这时,旁边的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飏碰杯,称赞他是“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”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的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,是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创举,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首批大使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实现了从将军到大使的角色转变,学习班的作用功不可没。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,1955年国家设立的外交学院成为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机构,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外交人才,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据《老年文汇报》姜长青 孟昭庚/文